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趋势脱钩： 中国将发挥关键作用并受益^{*}

杨盼盼 徐奇渊

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趋势脱钩以国际收支失衡加剧为背景，难以持续。危机之后，欧洲和日本的复苏疲弱、美国的再工业化以及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为代表的世界贸易规则重塑，都使这种趋势脱钩模式更加难以为继。中国当前的国内经济改革、对外走出去的战略，将在需求端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新的机会，在供给端通过直接投资改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潜在增速水平。因此，中国将有望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良性趋势脱钩中扮演关键的历史性角色。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向更为具体的经济影响力转变，进而提升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局部乃至全局的制定与协调能力，并从中获得实际利益。

关键词：新兴经济体 趋势脱钩 国内经济改革 包容性发展

中国能够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脱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了这种自发的选择。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前景决定了中国有能力成长为全球经济体中的重要锚。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中普通而特殊的一员，能够为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长期脱钩提供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前景广阔，能够成为新兴市场外需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中

作者杨盼盼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奇渊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 本文受到以下项目的支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未来十年世界经济格局演变趋势及我国发展战略调整研究”（12AZD05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二十国集团面临的全球治理重点问题研究”（11AGJ001），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南北合作、南南合作与全球经济治理”（2014YCXZD008），中国社科院创新工程重大课题“新兴经济体与国际经济新秩序”（2013YZDZB008）。作者感谢张蕴岭、黄海洲、张斌及其他参加“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国际环境”研讨会嘉宾的宝贵建议，当然文责自负。

国国内积累了大量储蓄，可以将其有效转化为投资，特别是国际投资，因此，中国又可以成为新兴市场获得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原来的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双向环流情形可以转变为一个三边的环流情形，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此前发达国家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帮助新兴市场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的趋势脱钩。

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脱钩成为广受关注的话题。2006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使用购买力平价的测算表明，2005年新兴经济体占全球产出的比例，首次超过50%。^[1]2012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副总裁朱民在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的发言中指出：当年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超过50%，这是人类历史上世界经济重心的巨大变化；而且可以预见，未来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还将不断地上升，未来5年新兴经济体对全球增长的贡献将达到2/3左右。^[2]

但是，过去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的优异表现，是否意味着新兴经济体已经撑起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半边天，实现了与发达国家的真正脱钩？这种脱钩是趋势意义上的，还是波动意义上的？脱钩的内在机理是怎样的，进而这一脱钩是否能够持续？这些问题将在正文第一部分进行讨论。

另一方面，从未来7年的战略机遇期^[3]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趋势、经济战略对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意味着什么？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内部改革、外部开放战略，在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脱钩过程中将发挥何种作用？本文第二、三部分将分别对这两个问题进行回答。

从中国外部环境视角来看，新兴经济体^[4]与发达经济体的趋势脱钩，将是新世纪以来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内，国际经济环境的重大变化之一。这种变化本身对世界经济大格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这种变化，对正处于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中国的内部经济结构改革将与国际外部环境的塑造深度契合。

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革、调整，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例如扩大内需、

[1] “Emerging Economies: Climbing Back”, *The Economist*, www.economist.com/node/5420756, 2006-1-19.

[2] 朱民：“变化中的世界”，2012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演讲会，2012年10月18日。

[3] 战略机遇期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的，是指“21世纪头20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按照战略机遇期的时间界定，中国已经度过了11年，还剩余7年战略机遇期。

[4] 为了从国际外部环境角度来讨论新兴经济体脱钩的意义，因此将新兴经济体的范围界定为：除了中国之外的新兴经济体。之后，除非特别说明，本文使用的新兴经济体口径，均为不包括中国的情况。

鼓励对外直接投资、过剩产能的部分向外转移、人民币国际化、组建金砖发展银行等等措施，都将有助于新兴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进行实体经济挂钩，以及金融市场的挂钩，同时也有助于其同发达经济体的相应脱钩。这将使得国内经济改革与外部经济环境的塑造进一步深度契合，为中国的包容性发展提供具体的实现机制，为中国在战略机遇期的内、外经济政策提供一个统一的战略框架。

其次，这将有利于中国改变外部经济环境中的不利因素，并顺势创造有利的外部经济条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在实体经济、金融部门的双重脱钩，将有助于打破“斯蒂格里茨怪圈”^[1]的魔咒，使中国成为新兴经济体趋势脱钩驻锚对象的同时，也有助于中国进一步多元化出口市场，改变不利的国际投资头寸分布状况、提高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局部甚至全局地位。

最后，基于国际经济格局的转变，以及中国在其中可望扮演的关键角色，中国将更有可能更为充分地将已有的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兑现为现实的国家利益。在深化内部改革、进一步发展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将帮助新兴经济体实现与发达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的脱钩，同时帮助新兴经济体在更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挂钩。在此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将向更为具体的经济影响力转变，进而提升中国对国际经济规则的局部甚至全局的制定、协调能力，并使规则为我所用、对我有利。

定义趋势脱钩

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人们常常使用脱钩一词形容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其内在含义是新兴市场在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之后，国内的经济结构和制度体系都已经趋于成熟，再加之自然资源、人力资源禀赋和后发优势，使得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已经不再需要依赖发达经济体。

上述关于脱钩现象的描述实质上讨论的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增长趋势意义上的脱钩，也是本文关注的脱钩。但是，在现实的经济学讨论中，人们讨论脱钩多是波动意义上的脱钩，关注的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波动意义上

[1] “斯蒂格利茨怪圈”是指，在国际资金循环中出现了新兴市场国家以资金支援发达国家（如许多东亚国家持有巨额外汇储备）的得不偿失的资本流动怪圈（Capital Doubtful Recycling）。其表现为新兴市场国家在以较高的成本从发达国家引进了过剩资本后，又以购买美国国债和证券投资等低收益形式把借来的资本倒流回去。

的关联性^[1]，或者是不加区分地关注经济增长（同时包含趋势和波动）的关联性。^[2]研究的基本结论分歧较小，新兴市场国家无法与发达国家实现波动意义上的脱钩，这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仍在金融市场上占据绝对主导，新兴市场国家无法避免这一冲击，金融危机加强这一影响。^[3]为了避免与波动意义上的脱钩混淆，我们采用趋势脱钩这一措辞与之进行区分。

将趋势脱钩单独进行讨论有以下几个优点：第一，趋势脱钩更贴近新兴市场国家中长期的增长目标，良性的脱钩应当来自于国内经济治理和政治制度的完善，这将带来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趋势意义上而非周期意义上的变动；第二，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及国际金融市场决定了短期之内波动意义上的脱钩难以实现，囿于这一脱钩的讨论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的长期增长帮助不大；第三，贸易和长期投资在新兴市场国家的迅速发展以及中国的崛起，使得在实体经济层面对趋势脱钩进行讨论变得更加迫切。

据此，我们给出趋势脱钩的定义：趋势脱钩（De-trending）：指一个经济体（或一类国家群体）与另一个经济体（或另一类国家群体）的经济增长趋势（或加权经济增长趋势）的差异。这一差异越大表明二者的趋势脱钩幅度越高，而差异越小则表明二者的趋势挂钩幅度越高。

难以持续的脱钩

根据对趋势脱钩的定义，我们可以计算出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脱钩趋势（图1）。图中的走势线代表的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趋势的差值^[4]，数值越高表示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速相对于发达国家越快，即趋势脱钩水平越高，而数值越低则意味着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出现趋势性挂钩。从图上可以看出，2000—2007年，这一数值持续上升，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出现了持

[1] 例如：Rose, Andrew, “Business Cycles Become Less Synchronised Over Time: Bunking ‘Decoupling’”, VOX, 1 August 2009.

[2] 例如：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3, “Dancing Together? Spillovers, Common Shocks, 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and Trade Linkages”, October 2013.

[3] Levy Yeyati, Eduardo, and Tomas Williams, “Emerging Economies in the 2000s: Real Decoupling and Financial Recoupling”,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 31.8 (2012): 2102–2126.

[4] 具体地，我们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新兴市场国家加权经济增长率和发达国家加权经济增长率作为原始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HP滤波求得趋势，再用新兴市场的经济增长趋势减去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得到趋势脱钩数据。

续的趋势脱钩现象。

脱钩一词蕴含了人们对新兴市场国家增长的良好期望，希望藉由新兴市场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脱钩，促进新兴市场的良性增长，避免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对新兴市场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但是，无情的现实粉碎了新兴市场的脱钩现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从全球最大的发达国家美国开始，随后债务危机在欧元区蔓延，如果按照脱钩逻辑，危机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中，新兴市场应当能够做到一枝独秀。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也遭受重创。此前的研究表明，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期间波动意义上脱钩出现了迅速下降，取而代之的是高度的相关性。^[1]而从我们趋势脱钩的分析来看，趋势脱钩在2008年时戛然而止，2010年之后经济增速之差出现了21世纪以来的首次缩窄，新兴市场 and 发达国家再度出现了趋势挂钩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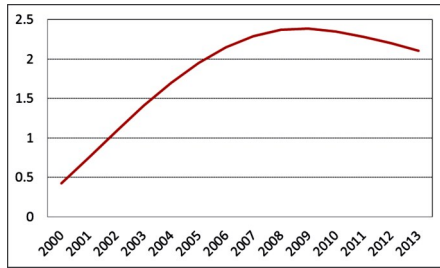


图1 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幅度

这使我们重新思考曾在2000—2007年出现的趋势脱钩现象。我们认为，这一趋势脱钩仅仅是表象，在实质上反映的是新兴市场 and 发达国家更加紧密的挂钩关系。

全球经济进入21世纪后出现了“大缓和”（Great Moderation），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平稳，并无严重的通货膨胀，国内消费普遍强劲。这客观上为新兴市场国家提供了旺盛的外部需求。从经济增长的意义来看，新兴市场国家在此时作为全球可贸易品的提供者，积极融入到全球贸易链中。外部需求的旺盛不仅带来了本国出口的增加，促进了经济增长，也带来了国内可贸易品部门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国内投资的迅速上升。与此同时，贸易品部门的迅速发展也带来了本国可贸易品部门全要素生产率的上升，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由此可见，发达国家旺

[1] 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Chapter 3, “Dancing Together? Spillovers, Common Shocks, and the Role of Financial and Trade Linkages”, October 2013.

盛的外部需求通过多个渠道对新兴市场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而从发达国家的市场来看，旺盛的需求使得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但是部分消费品来自新兴市场国家，因此，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促进效果有限。

正是基于贸易关系对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增长的非对称效应，我们观察到新兴市场经济增长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趋势脱钩，但脱钩背后蕴藏的实质上是挂钩，是二者之间日趋紧密的经贸联系。因此，这一脱钩本身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如果说在发达国家经济向好的时候，旺盛的需求能够带来促进新兴市场经济体发展的乘数效应，那么当发达国家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一需求的锐减就将成倍地给新兴市场经济体带来负面的效应，对新兴市场的出口和投资都产生显著的不利影响。在这样的一个新兴市场 and 发达国家的关联模式下，无论是脱钩还是挂钩，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而言都是被动的，其实质都是与发达国家的趋势挂钩过程。

在研究趋势脱钩问题时，不应忽视中国在其中的影响力。图2反映了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程度。整体而言，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和其他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是一致的：危机前，趋势脱钩幅度上升，危机后，趋势脱钩幅度下降。但是，中国既普通又特殊，对于中国趋势脱钩的分析应当从两个视角来看：一个视角是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普通一员，过去与发达国家大量贸易顺差推动的趋势脱钩不可持续，这一趋势脱钩模式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一样，已经瓦解；另一个视角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型开放经济体对全球经济的特殊影响力，从这一视角来看，中国对新兴市场 and 发达国家潜在趋势脱钩具有积极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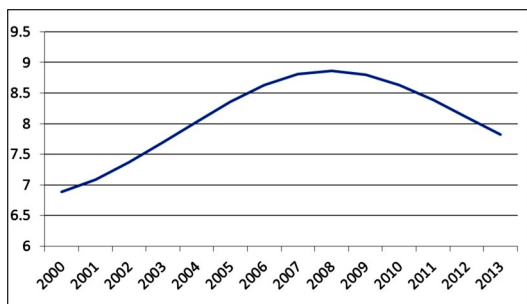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程度

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普通一员，危机前的趋势脱钩模式同样不可持续。除了上文提及的发达国家内需不可持续之外，中国的结构性失衡问题也逐渐暴露

出来。在2007年时，中国的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重达到了创纪录的10%。而从产业结构来看，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以可贸易品部门的发展为主，国内以服务业为代表的不可贸易品部门发展相对落后，根据2009年数据，中国服务业就业比重仅为34.1%，而发达国家这一水平普遍在70%以上，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的服务业占比也高于50%。这些客观存在的问题都使得中国有必要转变其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这个转型被迫迅速发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出口部门受到严重打击，出口年度增速迅速由两位数滑向个位数。也正是因为如此，中国也与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增长趋势上的再度挂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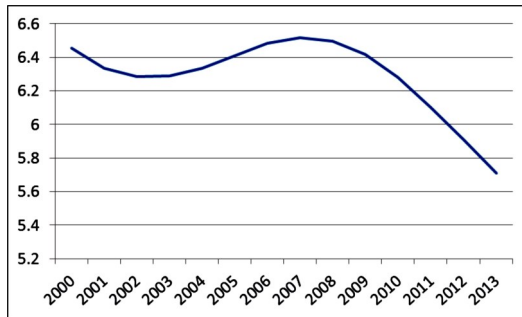


图3 新兴市场与中国的脱钩幅度

但是中国有其特殊性，中国已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规模占新兴市场总规模的近1/3。^[1]相对于其他新兴市场而言，与发达国家的相对趋势脱钩水平较高，比较图1和图2可知，其他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幅度和中国相比有接近7个百分点的差异，危机之后也是如此。即便中国的脱钩幅度在危机之后略有下降，但仍远高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这意味着，中国的脱钩对新兴市场与发达经济体的趋势脱钩有非常显著的贡献，中国仍是带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趋势脱钩的主要力量。如若此后中国与发达国家进一步实现趋势上的脱钩，那么这一影响将更加明显。更进一步地，中国作为开放型大国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同样在上升。图3描绘了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趋势脱钩关系，在危机之前，二者的关系变动非常小，但是在危机之后出现了下降的趋势，这意味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危机之后已经开始与中国进行趋势上的挂钩。在制定对外发展战略时，这一趋势应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

[1]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WEO）2013年10月数据库，中国2013年依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规模占比。

发达国家无法帮助新兴经济体可持续脱钩

上一节的分析表明，此前新兴市场同发达国家之间趋势脱钩实质上有赖于发达国家相对稳定的外部需求，危机之后，这一外部需求迅速下降，因而使得趋势脱钩也变得不可持续。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是否能够回到此前的脱钩状态，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能否再度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成为下一步外部环境走势判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是否定的，原因有二：第一，发达国家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将面临去杠杆的问题，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复苏的根基尚不牢固，强劲内需恐难再现；第二，发达国家难以容忍此前大规模的贸易赤字再度出现，开始通过订立新的贸易规则改变现有贸易格局，希望通过贸易促进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新兴市场被排除在外，固有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将被削弱。

（一）发达经济体正在经历复苏，但正面溢出效应相当有限

从整体来看，发达经济体的各部门，普遍积累了大规模的债务问题，因此，在后危机时代，由于背负着去杠杆压力的包袱，发达经济体的复苏之路将充满崎岖。其中，欧洲、日本的去杠杆化成效并不明显；而美国的实体经济复苏虽然较好，但其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势将对已有的进口贸易形成部分替代。

从欧洲的情况来看。金融危机之后，欧洲国家着力推进成员国的财政巩固，结果是政府债务余额占GDP比例总体有所下降，但紧缩的财政加剧了经济形势的恶化，这导致私人部门的债务负担比例进一步明显上升，并使得各部门加总的债务负担更为沉重；私人杠杆率的恶化还导致了私人部门投资、消费需求的疲弱。在此背景下，2013年下半年以来，伴随着卡门·瑞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和肯尼斯·罗格夫（Kenneth S. Rogoff）对政府债务的研究遭到质疑^[1]，欧洲主要国家之间对于是否继续严格执行财政巩固也出现了争论和动摇，短期内适度宽松财政政策、长期中进行财政巩固的声音占据了上风。但由于欧洲国家政

[1] 瑞因哈特与罗格夫2010年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的论文，研究了国际经验后指出：一旦一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率超过90%，则该国中位数经济增长率将会下降1个百分点。这篇文章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被认为，为欧债危机爆发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德法等国要求南欧国家实施财政巩固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在2013年，另外几位美国经济学家发现，这篇文章在数据计算过程中存在操作失误，在样本选择过程中存在主观偏差，其加权方法也令人质疑。但随后，两位作者对质疑进行了两次回应和反击。

府债务已经普遍处于相当高的水平，再加上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税收、福利体系改革面临困难等基本原因，欧洲国家的经济复苏势头仍面临诸多结构性的制约因素。

日本的情况似乎稍好，自2012年末以来，安倍经济学在货币、汇率、金融市场领域初见成效，实体经济增速也明显回升。但是，日本的债务问题也更为严重，2012年2季度末，日本各部门的总债务占GDP比例为506%，其中政府部门的债务占GDP比例为230%。虽然日本债务大部分为国内居民之间的负债，同时日本还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海外净资产，但是，研究表明2020年前后日本的净储蓄将消失。这意味着2020年前后，日本的国民净储蓄将无法支持国债负担的上升，实际上，如果考虑到国债负担是以一定速度上升的，则这个临界时点会明显早于2020年。基于这方面的考虑，安倍经济学也将积极推动财政巩固，尤其是在2015年之前，将消费税率由现行的5%提高到10%，在2014年，这一比率即将提升至8%。

另一方面，由于大地震之后，原先占全部能源13%的核电无法使用，导致日本对能源进口的依赖更为严重，因此货币宽松导致的日元贬值，使得能源进口成本上升，从而对日本经济形成了负向的供给冲击，因此货币宽松对日本实体经济的拉动也要大打折扣。再加上预期财政巩固政策效果的反向抵消，货币政策效果将再次缩水。在推行结构改革面临重重阻力的背景下，日本经济的复苏从中期来看仍不容乐观。

美国的实体经济复苏势头虽然良好，但其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的战略，势将对已有的进口贸易形成部分替代。2009年11月，美国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美国再工业化战略是对全球制造业产业布局的重构，其中涉及低端制造业从中国的转移以进一步降低成本、中端制造业的发展和回流以夯实美国实体经济基础、高端制造业的创新和创造以支撑美国未来经济增长。^[1]再加上近年来美国页岩气革命带来的能源成本优势，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将在其国内外市场上，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形成一定的替代压力。这其中，美国工业生产能力对国外进口商品的替代将是最为直接的影响。

（二）发达国家致力于改变贸易格局

此前，新兴市场的大规模顺差对应的是发达国家的大规模逆差，这是脱钩得

[1] 李丹：“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对我国制造业的多层级影响与对策”，《国际经贸探索》，2013年第6期。

以实现的基础。但是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已经决意改变其在贸易领域所处的地位，提升本国竞争力，扭转赤字局面。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制定贸易领域的游戏规则，这其中，以美国的举措最为显著。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2008年，美国正式宣布加入TPP谈判，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在国际贸易政策领域都鲜有实质作为。在TPP谈判的目标中，美国非常明确地表示，TPP是美国制定新贸易规则的范本，反映了美国对国际贸易的重视，并希望TPP能够成为美国改善贸易失衡的重要规则与手段，让贸易对促进美国经济增长和就业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1]除此之外，美国和欧盟也决意开展TTIP谈判，欧盟将这项谈判可能带来的潜在收益作为欧洲复新的一个重要契机。至此，TPP和TTIP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新型贸易规则，已经将主要发达经济体美、欧、日悉数囊括其中。不同以往的是，这些贸易谈判都具有高规格的特征，所涉及的领域也不仅仅是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还包含服务贸易和投资，对于一国经济体的内部运行状况也多有要求，例如对透明度、竞争中性、知识产权、环境保护等规则的要求。

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型贸易规则具有高质量、高标准特征，这也使得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在短期内难以加入其中，即便加入，也需要付出较高的代价。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二十国集团（G20）中所包含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大多都没有加入新贸易规则的谈判，客观而言，新贸易规则中的诸多内容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是难以实现的。

在过去，新兴市场国家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的受益者，但是自从多哈回合陷入停滞之后，WTO就逐渐被各种双边和多边的区域贸易规则所架空。尽管在2013年12月刚刚结束的WTO部长级会议上，达成了首个全球自由贸易协定，但是WTO要想恢复到原来的影响力，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国家通过订立高质量的贸易协定，实质上是尽可能多地提高自身的贸易竞争力，而暂时没有参与新型贸易协定谈判的新兴市场国家，本国的贸易就将受到负面影响。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说，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贸易转移效应，订立了新型贸易协定的国家，由于本区内的贸易壁垒将非常低，目标是去除所有产品的关税，因而会更加倾向于选择与已经缔约的国家进行贸易往来，新兴市场国家由于在增加值链中处于相对低端的位置，产品的可替代性较强，可能会丧失较多的市场份额。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类似，除了最终产

[1] Fergusson, Ian et al.,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Negotiations and Issues for Congres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rch 2013.

品之外，新兴市场国家还出口较多的原材料，但是新型贸易协定中的“原产地规则”对利用来源于非成员国的原材料生产出的产品在享受优惠关税时存在限制，因此，原材料的出口也会受到限制。第三个问题则是新兴市场国家在新规则面前并没有优势，譬如提高环境、劳工标准，保护知识产权等要求都会使得新兴市场国家的成本进一步上升，与发达国家已经率先实现上述标准不同，新兴市场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新兴市场的竞争力会被进一步削弱。

发达国家通过制定新贸易规则提升竞争力，新兴市场国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行之有效的应对之道，要回到此前的贸易顺差十分困难，因而，新兴市场国家依赖此前的方式恢复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已几乎不可能。

中国可能为其他新兴经济体的良性脱钩提供条件

从良性长期趋势脱钩来看，中国可能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的有利条件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需求端来看，中国内部消费需求的挖掘，将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更大的最终品销售市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发达国家经济疲弱带来的负面影响；其次，从供给端来看，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蓬勃发展，尤其是对其他新兴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迅速上升，也将从供给面改善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潜力。

具体来说，从需求端来看，中国正在推进的改革，将健全社会福利体系、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等等，这些因素都将有助于激发国内的消费需求，促进国内消费市场规模的扩大。一方面这有利于改变目前中国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驱动的模式，使经济增长的结构更为协调，从而也更为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在其他主要经济体消费市场萎靡的情况下，这也将为世界再创造出一个巨大的、活跃的最终产品消费市场。如果中国的GDP总量为50万亿人民币，即使不考虑经济增长，消费在GDP中比重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消费市场规模将上升5000亿人民币，约合830亿美元。IMF最近的研究表明，2011年和2012年，中国是世界上消费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而且在2013年，很可能还是如此。^[1]因此，对于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出口来说，正在日益崛起的中国消费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对发达经济体疲弱的最终消费市场起到替代作

[1] Steven Barnett, “China: Fastest Growing Consumer Market in the World”, 作者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地区主管。 <http://blog-imfdirect.imf.org/2013/12/02/china-fastest-growing-consumer-market-in-the-world/>，本文于2013年12月2日刊于IMF网站。

用。

此外，从三个角度来看，中国因素将改善新兴经济体的供给能力，从而提高其潜在经济增速。

第一，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在迅速上升。2012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流量创下历史新高，达到772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三。其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ODI）流量的比率在近年来也迅速上升，由2003年的0.5%上升至2012年的6.0%。^[1]随着中国不断放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审核限制，以及各种鼓励措施的出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还将继续上升。

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开发建设存在巨大资金需求缺口。以基础设施投资为例，新兴经济体的需求普遍旺盛。这方面需求主要来自于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尤其是城市化过程中所伴随的建设需求，另外也部分源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在经济赶超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示范效应。以金砖国国家为例，印度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就有巨大的潜在需求；巴西、南非的城市化水平虽然相对较高，但快速发展同样产生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需求。俄罗斯则由于石油出口方向的变化，对管道建设等能源相关基础设施的需求增长非常快。但是另外一方面，新兴经济体进行开发建设的资金需求，还远未获得满足。像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现有的区域机制安排，甚至包括世界银行等国际多边机制安排，都远远无法满足新兴经济体日益上升的投资、融资需求。

第三，中国新一届政府强调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关于过剩产能处理策略中也提到“转移一部分”，与此同时，推动企业走出去的措施也在陆续出台。这些措施都将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其他新兴经济体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此外，随着中国的工业园区模式、经济特区模式等发展模式的输出，尤其是中国在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对新兴经济体国家基础设施工程的协力开发建设，都将有利于其他新兴经济体改善经济的供给能力。

结 语

我们在本文中的讨论表明，新兴市场难以实现像危机前一样的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因为此前新兴市场积累大量顺差而发达国家积累大量逆差的格局已经

[1] 李国学、王永中、张明：“2013年第1季度中国对外投资报告”，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研究室国际投资研究系列（IIS）讨论稿，2013年3月18日。

难以重现。图4a反映的是当前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趋势脱钩机制，目前来看这一情况是不可持续的。这种脱钩的本质来自于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恐怖均衡”，它是脆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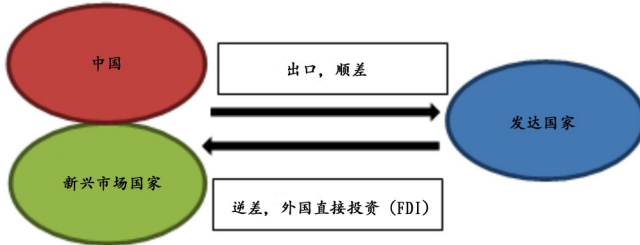


图4a 目前的趋势脱钩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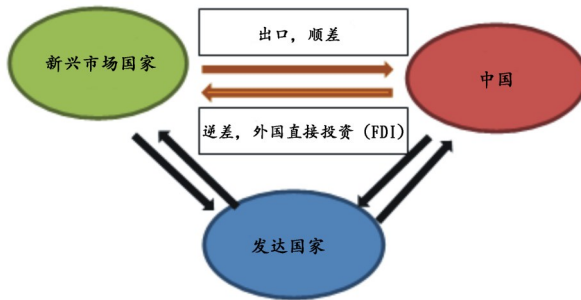


图4b 期望的趋势脱钩模式

中国能够在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脱钩中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危机之后新兴市场国家已经开始了这种自发的选择。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增长前景决定了中国有能力成长为全球经济体中的重要锚，这是图4b所描绘出的情形。中国作为新兴市场中普通而特殊的一员，能够为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脱钩提供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前景广阔，能够作为新兴市场外需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积累了大量储蓄，可以将其有效转化为投资，特别是国际投资，因此，中国又可以作为新兴市场获得直接投资的重要来源。原来的新兴市场与发达国家的双向环流情形可以转变为一个三边的环流情形，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承担此前发达国家的角色，在此基础上，帮助新兴市场实现与发达国家经济的趋势脱钩。■